

论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 蒋建农 曹子洋

[摘要] 本文从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军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基本遵循、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相互配合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制胜法宝等四个方面深入全面地阐述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牺牲奋斗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共同谱写的辉煌篇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导向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关键词] 抗日战争;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15)04-0015-09

[作者简介] 蒋建农,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曹子洋,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关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涉及抗战时期国共两党自身及其各自所领导武装队伍的状况、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状况等多方面的问题。从根本上讲,主要表现在国共对抗战进程的作用力与影响力如何。抗日战争是一个长达 14 年的历史过程,随着抗日战争进程的发展,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两支政治力量,各自的实力、地位在变,方针政策在变,所发挥作用的深度和广度也在变。因此,必须动态地、系统地、全方位地进行考察,才有可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本文从几个事关全局的重要方面,对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进行分析。

一、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面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的这场深重的民族灾难,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携手并肩承担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

侵略者的战略局面。在这场战争中,国共两党军队中共有 380 万将士牺牲^①,他们“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②。国共两党为抗日战争胜利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及其展现的爱国激情,决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失去光彩,“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③。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取得全面胜利的成功范例,将永远铭刻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

毋庸讳言,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除了一致抗日的共性外,由于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他们在抗战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在实行什么样的抗战路线,即是全面的抗战路线,还是片面的抗战路线;在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即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是游击战、运动战,还是正规战、阵地战;以及在抗战的外交、抗战时期的政治改革和战时的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

收稿日期 2015-07-01

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以及在抗日民主根据地行之有效的一系列民主民生政策,对国统区、对国民党军队、对国民党本身,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对国民党方面的动摇、专制、腐败等的监督、批评和揭露,也是扼制国民党进一步妥协、分裂、倒退的重要因素。相反,在国民党方面,由于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极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影响极其有限。他们的公开破坏活动,也因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而被极大地限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近代以后,中国人民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和民族内部软弱涣散。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中国共产党在倡导和推动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制定并坚定地贯彻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战术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逐步发展成为抗击日军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逐步成为抗击日军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示范区和核心区。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迭遭碰壁和全国军民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浪潮推动下,中国国民党逐渐调整政策,中国共产党率先倡导和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得以实现,并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成为全民族抗战最有效

的组织形式,成为抗日战争能够取得完全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一) 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与国民党政策的转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与国民党政府当时的“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32 年 4 月 15 日,刚刚成立不到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④。1933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方面进一步发出宣言,表示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些宣示了中国共产党誓死抵抗日本侵略和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也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联合战线的最初尝试。

在局部抗战阶段,中国共产党不仅参加并且积极推动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而且在东北领导开展了直接的抗日武装斗争。1933 年初,当东北义勇军自发的抗日武装斗争趋于低潮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先后在南满、东满、北满、吉东等地崛起。在此基础上,从 1933 年 9 月至 1936 年 2 月,先后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1 军至第 6 军。从 1936 年 2 月至 1937 年 10 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又陆续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 1 军至第 11 军。东北地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直接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战场。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在党的宣言、决议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在一个时期里曾经干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5 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置长期遭受血腥屠杀、围追堵截的阶级仇恨于身外,在《八一宣言》中再次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

事业而奋斗。”^⑤同年 12 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这些对于调动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一致对外的声势,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1936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改变“反蒋抗日”的政策,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将领当即向国民政府发出通电,表示“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⑥,并向国民党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国共产党的上述举动,给予国民党方面极大的触动,进一步解除了他们的顾虑。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

在上述历史过程中,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也在缓慢地发生转变:由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到一·二八事变后的“一面抵抗,一面谈判”,再到长城抗战时第一次有组织地进行较大规模的抵抗;由武力镇压主张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到只敢陈兵威胁,但最终被迫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国民党一方面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再屈辱地接受日本侵略者的停战条件,并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进步力量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召开国难会议,制定国防计划,修筑军事防线,恢复中苏邦交,准备抗日。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风起云涌的抗日热潮推动下,国民党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地方实力派,以及其他政治上的异己力量,进行接触、谈判,逐步地有条件地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发表对日态度强硬的庐山谈话。1937 年 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这标志着以抗日为共同目标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也标志着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二) 国共双方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分歧和斗争

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阶级和各阶层,既有

合作抗日的共性,又有各自的个性,甚至存在着某些方面的根本对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分别代表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两翼,国共之间的分歧及其相应政策实行后的结果将直接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巩固与发展,决定着抗日战争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毛泽东当时就深刻地指出:“中国能否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⑦

全面抗战爆发后,出现了举国一致团结御敌的可喜局面。国民党方面部分地改变了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开放言论,吸收过去的政治反对派参加政府和军队,设立国民参政会,制定《抗战建国纲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初步的巩固和发展。从而在战场上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 3 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为抗日战争的持续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方面由于在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的严重失利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他进步力量迅速发展的疑忌,加上日本政治诱降和英美对日实行绥靖主义政策的影响,在其内部出现对日妥协、动摇和警惕、敌视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动向。继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在“共同防共”旗帜下公开叛国投敌之后,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而后又陆续制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整套反共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加剧,并持续弥漫于抗日战争的后两个阶段。

对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保持党的独立性和争夺领导权的问题。针对党内同志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把持全国政权,共产党的力量不居支配地位而产生的对争夺领导权问题的疑惑,毛泽东在 1937 年 5 月就提出实现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任务的四条具体的原则: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奋斗目标;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成为实现奋斗目标的模范;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与同盟者建立联盟;共产党队伍的发展、坚强和思想统一。随后,又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他根据各阶级对抗战的态度,把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阶级和各阶层分为左、

中、右三个集团。其中,他认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右翼集团,“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⑧。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针对国民党方面的动摇、分裂、倒退倾向,中共中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⑨的主张。在全国抗战的实际斗争中,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和人民抗日武装的不断壮大,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逐步得到实现,成为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坚力量。

(三)一切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

尽管矛盾和冲突不断,但是国共双方都把抗日救国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中国共产党方面始终恪守在致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坚持不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游击战争和其他旨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活动。毛泽东曾反复告诫全党,这次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合作,国共之间的斗争是严重的、是不可避免的,但也不能因斗争而放弃统一。“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⑩“统一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基本的原则。”^⑪“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凡是可以多留一天的,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⑫他提出“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与“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相配合,以防止统一战线的破裂。在国民党方面,虽然反共和发动反共战争不断,但是在日本侵略者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不得不有所收敛。抗战期间的国共摩擦,国民党一直居于攻势,既有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挑衅,也有在经济上的封锁。处于守势的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通过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并采用有限的军事对抗以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从而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没有破裂,使得国共两党绝大部分的军队在八年抗战中一直是投入在抗日的战场上。这在根本上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

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而战。

三、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军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基本遵循

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这是国共两党的共识。客观地讲,是国民党方面最早提出持久战的观点。1933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军事整理会议上提出:“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地抵抗。……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⑬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最先提出持久战的称谓,而在于如何进行持久战的措施。对此,双方的主张却大相径庭。

国民党方面关于如何进行持久战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以空间换时间”。1938年2月7日,蒋介石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演讲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是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⑭二是“苦撑待变”。1938年1月27日,蒋介石在《认识抗战真谛与建立必胜基础》的演讲中指出:“只要我们能自强自立,能持久抗战,就天天可以促起日本利害相反的各国来包围日本,如此,国际形势不变也要变,各国不助我也就是助我。”^⑮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对国民党来说简直是天大喜讯,蒋介石在1941年1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抗战政略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⑯基于上述认识,国民党方面将整个抗日战争划分为两个阶段。蒋介石认为:“第一期的任务,在于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掩护我们后方的准备工作,确立长期抗战的基础,完成我们第二期抗战战略与政略上的一切布置。第二期的任务,就要承接前期奋斗的成绩,实施我们第一期中所布置的一切计划,发挥我们抗战的力量,以达到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的目的。”^⑰与此相关,国民党方面虽然不乏“全民战”“总动员”之类的口号,但实际上执行的却主要是正规战、阵地战、防御战、消耗战,是单一依靠其正规军的片面抗战路线,不敢实行放手发动群众的人民战争。

中国共产党方面则是在全面考察中日双方在政

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战争性质及其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⑧他接着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只有经过持久战,才能达到最后胜利。中共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蒋介石国民党有许多原则性的区别:

第一,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把相持阶段视为持久抗战转入最后胜利的枢纽,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精髓。“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国抗战的三幕戏,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员的努力,最精彩的闭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⑨针对国民党蒋介石把抗日战争划分为两个阶段的观点,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么,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了‘持久战’的外衣罢了。”^⑩

第二,中国共产党以独立自主作为自己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与出发点,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全体中国人民。与国民党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外援或消极地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不同,毛泽东在1936年7月16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主要依靠全体中国人民的联合作战。他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⑪他坚信,只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

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⑫。

第三,中国共产党系统地阐明并具体组织实施一条全面的抗战路线,这是实现持久战战略目标的根本保证。与国民党的单纯依靠政府和正规军的片面抗战路线相反,中国共产党认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⑬中国共产党主张不仅要进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还要进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并具体地提出一系列开放党禁、开放言论、改造政府、驱逐亲日分子、实施民主政治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优待抗属、抚恤军烈、赈济灾荒、废除苛捐什税、减租减息、惩治贪腐,以及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和联合各少数民族等共同抗战的政策主张。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今天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他们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和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决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⑭

第四,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整套与持久战战略相配套的战略方针和战役战术原则。1937年8月,应邀到南京出席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代表中共中央提交《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案认为:对日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应予以全线之反击;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我军处于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材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⑮在中国共产党方面建议的影响下,南京国防会议正式确定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虽然国民党在以后的抗战中实行片面抗战路线,使这一战略方针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但它在广大爱国人

士和部分国民党将领中产生了良好影响,对于坚定国民党军队的抗战信心,推动正面战场坚持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游击战战略和广泛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把持久战战略和全面抗战路线有机地融合为一,创造了以人民战争取得弱国战胜强国的光辉范例。中国共产党从“中日战争是大而弱的进步中的中国抵抗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基本特点出发,首次将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使之具有全局性意义。毛泽东分析指出:“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⑤毛泽东从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和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个方面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具体战略问题。他和中共中央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敌进我进”,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采用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系,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以游击战抗击了58%—75%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敌我力量彼消我涨和时局转换的枢纽。1943年夏,敌后战场率先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随后又发动春季攻势、夏季攻势,成为全面反攻的前沿阵地和战略基地,抗日游击战向运动战和攻坚战转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军。在全面抗战路线指引下蓬勃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完美演绎持久战总战略的核心和关键,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抗日战争条件下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新实践和新发展。

四、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相互配合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制胜法宝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

华南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推动下,指挥其近200万军队主要在日军进攻的正面作战,构成正面战场。随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渐次深入敌后,到1938年底,已在华北和华中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西南、晋冀豫、冀鲁豫、冀鲁边、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已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相互配合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制胜法宝。

第一,正面战场进行的会战、战役和大小战斗,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国民党掌握着政府,有数百万正规军,可以调动全国的资源和人力,因此在战争爆发初期是抵抗日军的主力军,并且在整个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也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主战场。虽然正面战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失地100多万平方公里,但客观地讲,这主要是因为中日之间实力悬殊所致。毛泽东在武汉失守之后,就曾判断日军还想向广州、西安、宜昌、长沙、衡州、梧州、北海、南昌、汕头、福州等地进攻。“我要停止敌之进攻,还需很大的努力,才能把战局过渡到敌我相持的有利局面。”^⑥必须看到,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组织进行过一些大规模的战役,如平津、淞沪、太原、徐州、武汉等会战中,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歼灭日军45万余人,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企图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1938年10月以后,正面战场长期处于相持状态。为抵御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队除发动了1939年冬季攻势之外,主要是进行了一些防御性的会战,如随枣、常德、长沙、中条山、衡阳、滇缅等。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主战场地位,逐渐为敌后战场替代,正面战场与正面战线的日军呈胶着状态。尽管如此,正面战场的抗击,进一步遏制了日军进攻的势头,歼灭了日军的大量有生力量。其对日军的牵制和构成严重威慑方面的作用不能低估。在敌后战场已经转入对日局部反攻阶段后,在正面战场却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一些高级将领的消极颓废,遭受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失地千里。1945年春,正面战场在缅北、云南、广西、湘西等地区转入反攻,成为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有力一击。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指挥的军队在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方面

起主导作用。在整个全面抗战时期,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军将士在抗战中英勇杀敌,壮烈牺牲,涌现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著名的抗日英烈和“八百壮士守四行”那样的英雄群体。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共伤亡 320 万之多。

第二,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已经证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无法独立完成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任务。国民党在政治民主、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方面的缺陷,影响了对抗战力量的发动和组织;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限制、打击,对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封锁、围困,对国内其他进步民主势力的束缚、压制,削弱和制约了抗日力量的发展;国民党执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军队组织指挥体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阵地战、防御战的战役战术和后期消极避战等待国际局势变化的战略方针,阻碍了抗日战争胜利进程的早日到来。尽管如此,必须充分肯定正面战场在战略防御阶段的英勇抵抗,不仅为经营西南、西北大后方争取了时间,而且为八路军、新四军等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充分肯定正面战场在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在抗击和牵制并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及在继续给予敌后战场以战略支持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方面军作用;必须充分肯定在 1943 年以前战斗在敌后战场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全面开辟敌后战场、牵制和抗击日军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正面战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两度派遣主力军队(分别为 10 个师和 20 多个师)深入缅甸对日作战,影响并改变了那里的战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1939 年 1 月,毛泽东曾高度评价正面战场和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如果“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展开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②

第三,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极其广阔的地域逐渐开辟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新战场,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1937 年 11 月太原

失守后,在华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中国共产党军队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占据主要地位。随着日军战略进攻的深入和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八路军主力勇敢地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与此同时,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至 1938 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支援下,对日军作战 1600 余次,歼敌 5.4 万余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创建了晋察冀等 10 余块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人口达 5000 万以上。虽然侵华日军已由战前的 17 个师团发展 34 个师团,但只能局促于主要城镇和主要交通沿线地区。从而极大地钳制了日军的作战,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加快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敌后战场的开辟,形成与正面战场相互依存共同抗敌的战略格局,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被动为主动,和正面战场对敌人构成了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

与正面战场常规作战的一次次战役不同,敌后游击战的重点是面而不是点,是持续发生时刻存在的而不是间歇性的,是整体而不是个别,是战略的而不是战役的,实质上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场特殊的战略大会战。1941 年和 1942 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进行了 5 次“治安强化运动”。1941 年出动兵力千人以上的“扫荡”69 次,万人到 7 万人的大“扫荡”9 次,1942 年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77 次,万人至 5 万人的大“扫荡”15 次。据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初步统计,从 1938 年 1 月至 1942 年 11 月底,华北各敌后根据地遭受“扫荡”的时间合计为 2430 日,平均每两天有 3 块根据地遭受“扫荡”,日军每次“扫荡”一块根据地投入兵力的总平均数为 9800 人。^③单就双方投入的兵力而言,虽然这些“扫荡”和反“扫荡”每一次投入的兵力(敌后根据地军民投入反“扫荡”的人数没有统计),可能没有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进行的 22 次会战多,但就战争的强度、密度和艰苦性、残酷性,以及其辐射面、人员的伤亡、物资的损耗同战果、影响等相比,丝毫不逊色于前者。

第四,1938 年 10 月中国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要承担者。敌后游击战成为消耗日军力量最为恰当的攻势战略,也成为消耗日军胆略与士气最为有效的心理战略,对改变

中日战争力量对比,使中国熬过最为艰难、也最为重要的相持阶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到1940年底,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敌后建立起拥有近1亿人口的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50万正规军。据统计,侵华日军1938年为68万人,其中敌后战场抗击数为40万,占58.8%;1939年为86万余人,敌后战场抗击数为54万,占62%;1945年为108.85万人,敌后战场抗击数为75.87万,占69%。^⑩1940年3月,汪精卫伪政权正式在南京粉墨登场,投降、妥协空气甚嚣尘上,面对日军在正面战线的逐步蚕食和正在酝酿的进攻西安,正面战场的军队疲于应付,而国际上因为英、法等国对日妥协,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被封闭,苏联又在与日本酝酿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国的国际通道几乎断绝。在中国抗战出现极其严峻的形势下,八路军组织105个团(20多万兵力)于8月20日到1941年1月24日,发动百团大战,有力地回击了国外的绥靖阴谋和国内的投降分裂势力,扼制了日军进攻西安和分割中国西南、西北的企图,给予正面战场重要支持,并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坚持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第五,国共军队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一方面表现在战略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同一个战场的直接配合。在战略防御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也参加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如忻口战役和太原会战。八路军从出师到1937年11月太原失守,以不足45000人的兵力(整个太原会战中国参战军队总数为580000)和劣势装备,作战100余次,歼灭日军1万多人,占整个太原会战歼敌总数的近一半,反映出八路军坚强的战斗力。国民党军队也参加了敌后战场的作战,国民政府1938年11月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还特别在敌后划定苏鲁战区和冀察战区,有13个师参战。为加强敌后的作战,国民党曾专门在南岳衡山举办了4期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亲自兼任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薛子正、边章伍、李涛等30多个共产党员担任军事、政治教官等职务。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军把用兵的重点压在敌后战场。战争初期被扣留和陆续开赴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抗日武装一起抗击着日寇的“扫荡”“清乡”,分担着敌后抗战的重任。但是,与

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相比,他们除了装备为优外,其他在思想觉悟、政治素质和游击战战略战术素养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距,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们执行的片面的抗战路线,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与大后方隔绝,处于日伪军的包围之中,又不依靠人民群众,生存维艰。为了保存实力和地盘,不少将领率部投降日本。1941年到1943年间,伪军数由1940年的35万剧增至81万。剩余的不是被消灭,就是溃不成军。到1943年,在敌后战场已经没有成建制的国民党军队存在。而抗击日军数量远远超过这些国民党军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日军的强力“扫荡”下虽然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八路军和新四军由1940年的50万减少到1941年的44万,不少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根据地面积萎缩,根据地人口由1亿减少到不足5000万。但是,由于得到和广大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并由于实行正规军与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系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终于在敌后战场站稳脚跟,并且很快得到恢复发展。在最困难的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⑪1943年夏季,敌后战场进入局部反攻阶段,主动进攻作战愈来愈占有重要地位,并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收复了大量失地,成为全面反攻的战略基地。面对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失地20万余平方公里的大溃败,八路军继派出有力武装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之后,又派出南下支队千里挺进赣粤边,收复新沦陷的国土。仅在1944年一年中,八路军、新四军就作战2万余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⑫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已达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抗日正规军91万,民兵220万。^⑬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不无自豪地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⑭。

第六,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开辟的敌后战场既相区别又互为依存,形成共同对敌的态势。虽然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曾参加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国民党指挥的抗日队伍也曾参加

敌后战场的对日作战。^⑤但是在总体上,正面战场是由国民党主导的,敌后战场则是由中国共产党起主导作用。对于两个战场互为依存的关系,毛泽东当年就明确指出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⑥。1943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进一步指出:“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⑦两个战场互为依存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首先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日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是由中日的国情和双方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其次,国共两党的因势利导和主观努力不可或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积极倡导和艰苦实践。此外,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在国共双方政治军事力量较量中所形成的历史特点,也对两个战场的出现和共存产生重要的影响。正是由于两个战场都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日军,所以才能共撑抗战大局,才能保证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阶段转化。两个战场共同抗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克敌制胜的最佳形式,是国共合作的结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重要的成就。

注释:

- ①③⑩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1931—1945)(修订本)[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5:316,313.
- ②⑧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3,140,140.
- 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45.
- 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65.
- 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61.
- ⑦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㐀㐁㐂㐃㐄㐅㐆㐇㐈㐉㐊㐋㐌㐍㐎㐏㐐㐑㐒㐓㐔㐕㐖㐗㐘㐙㐚㐛㐜㐝㐞㐟㐠㐡㐢㐣㐤㐥㐦㐧㐨㐩㐪㐫㐬㐭㐮㐯㐰㐱㐲㐳㐴㐵㐶㐷㐸㐹㐺㐻㐼㐽㐾㐿㑀㑁㑂㑃㑄㑅㑆㑇㑈㑉㑊㑋㑌㑍㑎㑏㑐㑑㑒㑓㑔㑕㑖㑗㑘㑙㑚㑛㑜㑝㑞㑟㑠㑡㑢㑣㑤㑥㑦㑧㑨㑩㑪㑫㑬㑭㑮㑯㑰㑱㑲㑳㑴㑵㑶㑷㑸㑹㑺㑻㑼㑽㑾㑿㒀㒁㒂㒃㒄㒅㒆㒇㒈㒉㒊㒋㒌㒍㒎㒏㒐㒑㒒㒓㒔㒕㒖㒗㒘㒙㒚㒛㒜㒝㒞㒟㒠㒡㒢㒣㒤㒥㒦㒧㒨㒩㒪㒫㒬㒭㒮㒯㒰㒱㒲㒳㒴㒵㒶㒷㒸㒹㒺㒻㒼㒽㒾㒿㓀㓁㓂㓃㓄㓅㓆㓇㓈㓉㓊㓋㓌㓍㓎㓏㓐㓑㓒㓓㓔㓕㓖㓗㓘㓙㓚㓛㓜㓝㓞㓟㓠㓡㓢㓣㓤㓥㓦㓧㓨㓩㓪㓫㓬㓭㓮㓯㓰㓱㓲㓳㓴㓵㓶㓷㓸㓹㓺㓻㓼㓽㓾㓿㔀㔁㔂㔃㔄㔅㔆㔇㔈㔉㔊㔋㔌㔍㔎㔏㔐㔑㔒㔓㔔㔕㔖㔗㔘㔙㔚㔛㔜㔝㔞㔟㔠㔡㔢㔣㔤㔥㔦㔧㔨㔩㔪㔫㔬㔭㔮㔯㔰㔱㔲㔳㔴㔵㔶㔷㔸㔹㔺㔻㔼㔽㔾㔿㕀㕁㕂㕃㕄㕅㕆㕇㕈㕉㕊㕋㕌㕍㕎㕏㕐㕑㕒㕓㕔㕕㕖㕗㕘㕙㕚㕛㕜㕝㕞㕟㕠㕡㕢㕣㕤㕥㕦㕧㕨㕩㕪㕫㕬㕭㕮㕯㕰㕱㕲㕳㕴㕵㕶㕷㕸㕹㕺㕻㕼㕽㕾㕿㖀㖁㖂㖃㖄㖅㖆㖇㖈㖉㖊㖋㖌㖍㖎㖏㖐㖑㖒㖓㖔㖕㖖㖗㖘㖙㖚㖛㖜㖝㖞㖟㖠㖡㖢㖣㖤㖥㖦㖧㖨㖩㖪㖫㖬㖭㖮㖯㖰㖱㖲㖳㖴㖵㖶㖷㖸㖹㖺㖻㖼㖽㖾㖿㗀㗁㗂㗃㗄㗅㗆㗇㗈㗉㗊㗋㗌㗍㗎㗏㗐㗑㗒㗓㗔㗕㗖㗗㗘㗙㗚㗛㗜㗝㗞㗟㗠㗡㗢㗣㗤㗥㗦㗧㗨㗩㗪㗫㗬㗭㗮㗯㗰㗱㗲㗳㗴㗵㗶㗷㗸㗹㗺㗻㗼㗽㗾㗿㘀㘁㘂㘃㘄㘅㘆㘇㘈㘉㘊㘋㘌㘍㘎㘏㘐㘑㘒㘓㘔㘕㘖㘗㘘㘙㘚㘛㘜㘝㘞㘟㘠㘡㘢㘣㘤㘥㘦㘧㘨㘩㘪㘫㘬㘭㘮㘯㘰㘱㘲㘳㘴㘵㘶㘷㘸㘹㘺㘻㘼㘽㘾㘿㙀㙁㙂㙃㙄㙅㙆㙇㙈㙉㙊㙋㙌㙍㙎㙏㙐㙑㙒㙓㙔㙕㙖㙗㙘㙙㙚㙛㙜㙝㙞㙟㙠㙡㙢㙣㙤㙥㙦㙧㙨㙩㙪㙫㙬㙭㙮㙯㙰㙱㙲㙳㙴㙵㙶㙷㙸㙹㙺㙻㙼㙽㙾㙿㚀㚁㚂㚃㚄㚅㚆㚇㚈㚉㚊㚋㚌㚍㚎㚏㚐㚑㚒㚓㚔㚕㚖㚗㚘㚙㚚㚛㚜㚝㚞㚟㚠㚡㚢㚣㚤㚥㚦㚧㚨㚩㚪㚫㚬㚭㚮㚯㚰㚱㚲㚳㚴㚵㚶㚷㚸㚹㚺㚻㚼㚽㚾㚿㜀㜁㜂㜃㜄㜅㜆㜇㜈㜉㜊㜋㜌㜍㜎㜏㜐㜑㜒㜓㜔㜕㜖㜗㜘㜙㜚㜛㜜㜝㜞㜟㜠㜡㜢㜣㜤㜥㜦㜧㜨㜩㜪㜫㜬㜭㜮㜯㜰㜱㜲㜳㜴㜵㜶㜷㜸㜹㜺㜻㜼㜽㜾㜿㝀㝁㝂㝃㝄㝅㝆㝇㝈㝉㝊㝋㝌㝍㝎㝏㝐㝑㝒㝓㝔㝕㝖㝗㝘㝙㝚㝛㝜㝝㝞㝟㝠㝡㝢㝣㝤㝥㝦㝧㝨㝩㝪㝫㝬㝭㝮㝯㝰㝱㝲㝳㝴㝵㝶㝷㝸㝹㝺㝻㝼㝽㝾㝿㞀㞁㞂㞃㞄㞅㞆㞇㞈㞉㞊㞋㞌㞍㞎㞏㞐㞑㞒㞓㞔㞕㞖㞗㞘㞙㞚㞛㞜㞝㞞㞟㞠㞡㞢㞣㞤㞥㞦㞧㞨㞩㞪㞫㞬㞭㞮㞯㞰㞱㞲㞳㞴㞵㞶㞷㞸㞹㞺㞻㞼㞽㞾㞿㟀㟁㟂㟃㟄㟅㟆㟇㟈㟉㟊㟋㟌㟍㟎㟏㟐㟑㟒㟓㟔㟕㟖㟗㟘㟙㟚㟛㟜㟝㟞㟟㟠㟡㟢㟣㟤㟥㟦㟧㟨㟩㟪㟫㟬㟭㟮㟯㟰㟱㟲㟳㟴㟵㟶㟷㟸㟹㟺㟻㟼㟽㟾㟿㠀㠁㠂㠃㠄㠅㠆㠇㠈㠉㠊㠋㠌㠍㠎㠏㠐㠑㠒㠓㠔㠕㠖㠗㠘㠙㠚㠛㠜㠝㠞㠟㠠㠡㠢㠣㠤㠥㠦㠧㠨㠩㠪㠫㠬㠭㠮㠯㠰㠱㠲㠳㠴㠵㠶㠷㠸㠹㠺㠻㠼㠽㠾㠿㡀㡁㡂㡃㡄㡅㡆㡇㡈㡉㡊㡋㡌㡍㡎㡏㡐㡑㡒㡓㡔㡕㡖㡗㡘㡙㡚㡛㡜㡝㡞㡟㡠㡡㡢㡣㡤㡥㡦㡧㡨㡩㡪㡫㡬㡭㡮㡯㡰㡱㡲㡳㡴㡵㡶㡷㡸㡹㡺㡻㡼㡽㡾㡿㢀㢁㢂㢃㢄㢅㢆㢇㢈㢉㢊㢋㢌㢍㢎㢏㢐㢑㢒㢓㢔㢕㢖㢗㢘㢙㢚㢛㢜㢝㢞㢟㢠㢡㢢㢣㢤㢥㢦㢧㢨㢩㢪㢫㢬㢭㢮㢯㢰㢱㢲㢳㢴㢵㢶㢷㢸㢹㢺㢻㢼㢽㢾㢿㣀㣁㣂㣃㣄㣅㣆㣇㣈㣉㣊㣋㣌㣍㣎㣏㣐㣑㣒㣓㣔㣕㣖㣗㣘㣙㣚㣛㣜㣝㣞㣟㣠㣡㣢㣣㣤㣥㣦㣧㣨㣩㣪㣫㣬㣭㣮㣯㣰㣱㣲㣳㣴㣵㣶㣷㣸㣹㣺㣻㣼㣽㣾㣿㤀㤁㤂㤃㤄㤅㤆㤇㤈㤉㤊㤋㤌㤍㤎㤏㤐㤑㤒㤓㤔㤕㤖㤗㤘㤙㤚㤛㤜㤝㤞㤟㤠㤡㤢㤣㤤㤥㤦㤧㤨㤩㤪㤫㤬㤭㤮㤯㤰㤱㤲㤳㤴㤵㤶㤷㤸㤹㤺㤻㤼㤽㤾㤿㥀㥁㥂㥃㥄㥅㥆㥇㥈㥉㥊㥋㥌㥍㥎㥏㥐㥑㥒㥓㥔㥕㥖㥗㥘㥙㥚㥛㥜㥝㥞㥟㥠㥡㥢㥣㥤㥥㥦㥧㥨㥩㥪㥫㥬㥭㥮㥯㥰㥱㥲㥳㥴㥵㥶㥷㥸㥹㥺㥻㥼㥽㥾㥿㦀㦁㦂㦃㦄㦅㦆㦇㦈㦉㦊㦋㦌㦍㦎㦏㦐㦑㦒㦓㦔㦕㦖㦗㦘㦙㦚㦛㦜㦝㦞㦟㦠㦡㦢㦣㦤㦥㦦㦧㦨㦩㦪㦫㦬㦭㦮㦯㦰㦱㦲㦳㦴㦵㦶㦷㦸㦹㦺㦻㦼㦽㦾㦿㧀㧁㧂㧃㧄㧅㧆㧇㧈㧉㧊㧋㧌㧍㧎㧏㧐㧑㧒㧓㧔㧕㧖㧗㧘㧙㧚㧛㧜㧝㧞㧟㧠㧡㧢㧣㧤㧥㧦㧧㧨㧩㧪㧫㧬㧭㧮㧯㧰㧱㧲㧳㧴㧵㧶㧷㧸㧹㧺㧻㧼㧽㧾㧿㨀㨁㨂㨃㨄㨅㨆㨇㨈㨉㨊㨋㨌㨍㨎㨏㨐㨑㨒㨓㨔㨕㨖㨗㨘㨙㨚㨛㨜㨝㨞㨟㨠㨡㨢㨣㨤㨥㨦㨧㨨㨩㨪㨫㨬㨭㨮㨯㨰㨱㨲㨳㨴㨵㨶㨷㨸㨹㨺㨻㨼㨽㨾㨿㩀㩁㩂㩃㩄㩅㩆㩇㩈㩉㩊㩋㩌㩍㩎㩏㩐㩑㩒㩓㩔㩕㩖㩗㩘㩙㩚㩛㩜㩝㩞㩟㩠㩡㩢㩣㩤㩥㩦㩧㩨㩩㩪㩫㩬㩭㩮㩯㩰㩱㩲㩳㩴㩵㩶㩷㩸㩹㩺㩻㩼㩽㩾㩿㪀㪁㪂㪃㪄㪅㪆㪇㪈㪉㪊㪋㪌㪍㪎㪏㪐㪑㪒㪓㪔㪕㪖㪗㪘㪙㪚㪛㪜㪝㪞㪟㪠㪡㪢㪣㪤㪥㪦㪧㪨㪩㪪㪫㪬㪭㪮㪯㪰㪱㪲㪳㪴㪵㪶㪷㪸㪹㪺㪻㪼㪽㪾㪿㫀㫁㫂㫃㫄㫅㫆㫇㫈㫉㫊㫋㫌㫍㫎㫏㫐㫑㫒㫓㫔㫕㫖㫗㫘㫙㫚㫛㫜㫝㫞㫟㫠㫡㫢㫣㫤㫥㫦㫧㫨㫩㫪㫫㫬㫭㫮㫯㫰㫱㫲㫳㫴㫵㫶㫷㫸㫹㫺㫻㫼㫽㫾㫿㬀㬁㬂㬃㬄㬅㬆㬇㬈㬉㬊㬋㬌㬍㬎㬏㬐㬑㬒㬓㬔㬕㬖㬗㬘㬙㬚㬛㬜㬝㬞㬟㬠㬡㬢㬣㬤㬥㬦㬧㬨㬩㬪㬫㬬㬭㬮㬯㬰㬱㬲㬳㬴㬵㬶㬷㬸㬹㬺㬻㬼㬽㬾㬿㭀㭁㭂㭃㭄㭅㭆㭇㭈㭉㭊㭋㭌㭍㭎㭏㭐㭑㭒㭓㭔㭕㭖㭗㭘㭙㭚㭛㭜㭝㭞㭟㭠㭡㭢㭣㭤㭥㭦㭧㭨㭩㭪㭫㭬㭭㭮㭯㭰㭱㭲㭳㭴㭵㭶㭷㭸㭹㭺㭻㭼㭽㭾㭿㮀㮁㮂㮃㮄㮅㮆㮇㮈㮉㮊㮋㮌㮍㮎㮏㮐㮑㮒㮓㮔㮕㮖㮗㮘㮙㮚㮛㮜㮝㮞㮟㮠㮡㮢㮣㮤㮥㮦㮧㮨㮩㮪㮫㮬㮭㮮㮯㮰㮱㮲㮳㮴㮵㮶㮷㮸㮹㮺㮻㮼㮽㮾㮿㯀㯁㯂㯃㯄㯅㯆㯇㯈㯉㯊㯋㯌㯍㯎㯏㯐㯑㯒㯓㯔㯕㯖㯗㯘㯙㯚㯛㯜㯝㯞㯟㯠㯡㯢㯣㯤㯥㯦㯧㯨㯩㯪㯫㯬㯭㯮㯯㯰㯱㯲㯳㯴㯵㯶㯷㯸㯹㯺㯻㯼㯽㯾㯿㰀㰁㰂㰃㰄㰅㰆㰇㰈㰉㰊㰋㰌㰍㰎㰏㰐㰑㰒㰓㰔㰕㰖㰗㰘㰙㰚㰛㰜㰝㰞㰟㰠㰡㰢㰣㰤㰥㰦㰧㰨㰩㰪㰫㰬㰭㰮㰯㰰㰱㰲㰳㰴㰵㰶㰷㰸㰹㰺㰻㰼㰽㰾㰿㱀㱁㱂㱃㱄㱅㱆㱇㱈㱉㱊㱋㱌㱍㱎㱏㱐㱑㱒㱓㱔㱕㱖㱗㱘㱙㱚㱛㱜㱝㱞㱟㱠㱡㱢㱣㱤㱥㱦㱧㱨㱩㱪㱫㱬㱭㱮㱯㱰㱱㱲㱳㱴㱵㱶㱷㱸㱹㱺㱻㱼㱽㱾㱿㲀㲁㲂㲃㲄㲅㲆㲇㲈㲉㲊㲋㲌㲍㲎㲏㲐㲑㲒㲓㲔㲕㲖㲗㲘㲙㲚㲛㲜㲝㲞㲟㲠㲡㲢㲣㲤㲥㲦㲧㲨㲩㲪㲫㲬㲭㲮㲯㲰㲱㲲㲳㲴㲵㲶㲷㲸㲹㲺㲻㲼㲽㲾㲿㳀㳁㳂㳃㳄㳅㳆㳇㳈㳉㳊㳋㳌㳍㳎㳏㳐㳑㳒㳓㳔㳕㳖㳗㳘㳙㳚㳛㳜㳝㳞㳟㳠㳡㳢㳣㳤㳥㳦㳧㳨㳩㳪㳫㳬㳭㳮㳯㳰㳱㳲㳳㳴㳵㳶㳷㳸㳹㳺㳻㳼㳽㳾㳿㴀㴁㴂㴃㴄㴅㴆㴇㴈㴉㴊㴋㴌㴍㴎㴏㴐㴑㴒㴓㴔㴕㴖㴗㴘㴙㴚㴛㴜㴝㴞㴟㴠㴡㴢㴣㴤㴥㴦㴧㴨㴩㴪㴫㴬㴭㴮㴯㴰㴱㴲㴳㴴㴵㴶㴷㴸㴹㴺㴻㴼㴽㴾㴿㵀㵁㵂㵃㵄㵅㵆㵇㵈㵉㵊㵋㵌㵍㵎㵏㵐㵑㵒㵓㵔㵕㵖㵗㵘㵙㵚㵛㵜㵝㵞㵟㵠㵡㵢㵣㵤㵥㵦㵧㵨㵩㵪㵫㵬㵭㵮㵯㵰㵱㵲㵳㵴㵵㵶㵷㵸㵹㵺㵻㵼㵽㵾㵿㶀㶁㶂㶃㶄㶅㶆㶇㶈㶉㶊㶋㶌㶍㶎㶏㶐㶑㶒㶓㶔㶕㶖㶗㶘㶙㶚㶛㶜㶝㶞㶟㶠㶡㶢㶣㶤㶥㶦㶧㶨㶩㶪㶫㶬㶭㶮㶯㶰㶱㶲㶳㶴㶵㶶㶷㶸㶹㶺㶻㶼㶽㶾㶿㷀㷁㷂㷃㷄㷅㷆㷇㷈㷉㷊㷋㷌㷍㷎㷏㷐㷑㷒㷓㷔㷕㷖㷗㷘㷙㷚㷛㷜㷝㷞㷟㷠㷡㷢㷣㷤㷥㷦㷧㷨㷩㷪㷫㷬㷭㷮㷯㷰㷱㷲㷳㷴㷵㷶㷷㷸㷹㷺㷻㷼㷽㷾㷿㸀㸁㸂㸃㸄㸅㸆㸇㸈㸉㸊㸋㸌㸍㸎㸏㸐㸑㸒㸓㸔㸕㸖㸗㸘㸙㸚㸛㸜㸝㸞㸟㸠㸡㸢㸣㸤㸥㸦㸧㸨㸩㸪㸫㸬㸭㸮㸯㸰㸱㸲㸳㸴㸵㸶㸷㸸㸹㸺㸻㸼㸽㸾㸿㹀㹁㹂㹃㹄㹅㹆㹇㹈㹉㹊㹋㹌㹍㹎㹏㹐㹑㹒㹓㹔㹕㹖㹗㹘㹙㹚㹛㹜㹝㹞㹟㹠㹡㹢㹣㹤㹥㹦㹧㹨㹩㹪㹫㹬㹭㹮㹯㹰㹱㹲㹳㹴㹵㹶㹷㹸㹹㹺㹻㹼㹽㹾㹿㺀㺁㺂㺃㺄㺅㺆㺇㺈㺉㺊㺋㺌㺍㺎㺏㺐㺑㺒㺓㺔㺕㺖㺗㺘㺙㺚㺛㺜㺝㺞㺟㺠㺡㺢㺣㺤㺥㺦㺧㺨㺩㺪㺫㺬㺭㺮㺯㺰㺱㺲㺳㺴㺵㺶㺷㺸㺹㺺㺻㺼㺽㺾㺿㻀㻁㻂㻃㻄㻅㻆㻇㻈㻉㻊㻋㻌㻍㻎㻏㻐㻑㻒㻓㻔㻕㻖㻗㻘㻙㻚㻛㻜㻝㻞㻟㻠㻡㻢㻣㻤㻥㻦㻧㻨㻩㻪㻫㻬㻭㻮㻯㻰㻱㻲㻳㻴㻵㻶㻷㻸㻹㻺㻻㻼㻽㻾㻿㼀㼁㼂㼃㼄㼅㼆㼇㼈㼉㼊㼋㼌㼍㼎㼏㼐㼑㼒㼓㼔㼕㼖㼗㼘㼙㼚㼛㼜㼝㼞㼟㼠㼡㼢㼣㼤㼥㼦㼧㼨㼩㼪㼫㼬㼭㼮㼯㼰㼱㼲㼳㼴㼵㼶㼷㼸㼹㼺㼻㼼㼽㼾㼿㽀㽁㽂㽃㽄㽅㽆㽇㽈㽉㽊㽋㽌㽍㽎㽏㽐㽑㽒㽓㽔㽕㽖㽗㽘㽙㽚㽛㽜㽝㽞㽟㽠㽡㽢㽣㽤㽥㽦㽧㽨㽩㽪㽫㽬㽭㽮㽯㽰㽱㽲㽳㽴㽵㽶㽷㽸㽹㽺㽻㽼㽽㽾㽿㿀㿁㿂㿃㿄㿅㿆㿇㿈㿉㿊㿋㿌㿍㿎㿏㿐㿑㿒㿓㿔㿕㿖㿗㿘㿙㿚㿛㿜㿝㿞㿟㿠㿡㿢㿣㿤㿥㿦㿧㿨㿩㿪㿫㿬㿭㿮㿯㿰㿱㿲㿳㿴㿵㿶㿷㿸㿹㿺㿻㿼㿽㿾㿿

责任编辑 李瑞山